

# 从“合邦”、“一体”到 “大亚细亚主义”

——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形态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大东合邦”、“亚细亚一体”、“大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它与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其实质都是并吞中国。其中,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在东亚建立“大东国”,其用心就是要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而小寺谦吉的长达1200多页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则集大亚细亚理论之大成,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来“改造”中国,最终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

**关键词:**日本;侵华理论;大东合邦;亚细亚一体;大亚细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5)02-0077-08

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等赤裸裸的武力犯华论相对应,明治初年,又有学者文人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他们不是主张“脱亚”,而是提出“兴亚”或“振亚”。前者主张“出”,后者主张“入”,表面看去很不相同,但只是途径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并最终使中国成为日本的属国。

“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身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但年轻时即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带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樽井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18年就写好《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

**收稿日期:**2004-12-15 **基金项目:**北京市“十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作者简介:**王向远(1962—),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不无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樽井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支那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1910年该书再版,再版本与初版本有所添削,但内容基本相同。

《大东合邦论》十六章,包括《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态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汉土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源》《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等。《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藤吉认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和“亲和”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欧洲那样的“异种族混合”的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是自然的,“竞争”也带来了西洋文明的发达。但是,在东洋这样的统一的“单一种族繁殖”的“黄人”社会中,“竞争”是有害无益的,而应该奉行与“竞争”相对立的“亲和”原则。樽井把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都看成是“单一种族”。当然他所谓的“单一种族”,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众所周知,单一民族的标志不仅仅是肤色,还有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区域等多种复杂因素。樽井把欧洲说成是“异族混合的社会”时,没有考虑欧洲是“白人”的社会,而在把东亚说成是“单一种族”的时候,却仅仅以“黄人”的肤色为根据。他坚持这一双重标准,目的显然就是要说明东亚是“一种族”的,因而有着“亲和”的基础。他在《世态变迁》(上)中写道:“凡社会由一种族成者,亲爱之情为厚;亲爱之情厚,则伦理自存。伦理存,则和顺之习成性,和顺成性,则尊父老;尊父老则裁制者起;裁制者起,则协力分劳;协力分劳社会因以创焉。故社会以一种族成者,其秩序自成族制;族制即定,则人民自治。而自治所重在教化,不在法律也。故汉土上古,以无为治天下。”既然是“单一种族”,就需要“亲和”,而“亲和”的结果,就是要“大东合邦”。就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樽井藤吉提出了“大东合邦”的构想。他提出了“大东合邦”的两个步骤。第一就是与朝鲜“合邦”,第二是与中国“合纵”。

关于与朝鲜“合邦”,樽井藤吉认为,为了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控制,必须把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使其与日本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在序言中指出:“日韩合并之事,假令不成于当日,而他日岂无合同之机哉!就宇内大势而察之,二国各自独立者,非千岁之长计也。”关于与中国(樽井有时称“清国”,有时称“支那”)的“合纵”,樽井在《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一章中说:其实大东合邦,应该包含清国,但清国太大,并非仅仅依靠协议就可以合邦,何况境内之鞑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从。所以现在只能指望与清国“合纵”。即使日本与清国难以“合邦”,也可以先实现“合纵”。这种“合纵”是“大东合邦”的基础,而“合纵”则对清国极有必要。他认为“清国今日之忧,实在西南及北方,倘失策于东方,则四面皆敌也”,清国面临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而清国只有与日本联合起来,才有能力抵抗西方的侵略。而且“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巩固,则〔汉人〕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樽井认为,“合纵”应该以日本为主导,因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成了先进国家。而清国则不然,樽井在《汉土情况》一章中,列举了“支那”的九条坏处,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与西方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开了一个“恶例”;而“我国欲除此恶例,使我同种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顾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让香港,使英国人有了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必殃及东方各国;清廷屈服俄国压力,使俄国势力侵入黑龙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鲜增添了北方的忧患;清廷将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法国,使法国人得以利用越南与东方同种各国为敌;清廷没有对缅甸采取应有的怀柔措施,致使缅甸为英国人所据;清国盗贼横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鸦片,女人愿裹小脚,思想拘束,学问不长进……如此等等,总之,他认为清国懦弱顽钝已成积习,一旦为白人所据,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国长计,在使其不足恃者为足恃……大

东合邦，清国有益无害……日韩致盛大，则是为清国之强援也”。在他看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以日本为盟主，建立“大东国”，对清国和朝鲜都有好处。樽井强调“大东合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入侵，在《世态变迁》（上）中，他说：“今日百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嬴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他强调，现在是世界剧烈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且竞争剧，则优胜劣败亦甚速。犹春秋之列国，遂为七雄，七雄亦不久，遂为秦。呜呼！东亚诸国不讲使彼不得为秦之策，则彼遂为秦矣”。

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维新前上述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论，相反，却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它与佐藤信渊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但它比起佐藤信渊的理论，更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他的建立东亚强盛国家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观点，对后来日本的侵华理论影响甚大。樽井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理论主张，都与“大东合邦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东合邦论》初版本出版约十年后，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先后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冈仓天心曾广泛游历中国、西洋和印度，精通英文，他对西洋近代文明的特性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西洋白人早晚要独霸世界，而亚洲人必须连为一体，方能保证亚洲的独立。因此他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开首第一句话就是“亚洲是一个”（意即“亚洲是一个整体”）。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在亚洲，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他亦称为支那）、印度等其它各国都不行。为什么呢？在他看来，能够把东洋文明的优良传统保留下来的只有日本。而在支那，由于外族入侵、由于暴民起义、由于不断改朝换代，已经把东洋文明丢光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并能将东洋文化发扬光大。因此，日本天然地应该成为统一后的亚洲的指导者。冈仓天心的这些主张与藤井的“大东合邦”在基本精神上一脉相承，都是近代日本“大亚细亚理论”中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述形态。<sup>①</sup>

进入日本大正年间，也就是中国的民国时代之后，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政局的急剧动荡，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侵华性质更为露骨地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堪称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和集大成。小寺谦吉（1877～1949），1908年起六次任众议员，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可谓亚细亚主义的集大成。

《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长达1272页。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写道：“奇哉！在统驭或压倒亚细亚的欧罗巴，却叫嚣‘黄祸论’，而受白色人种政府威胁的有色人种，却少有叫喊‘白祸’者。黄祸早已成为梦呓，而白祸却是事实。”就明白地表示出，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以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对立这一种族主义立场来进行其理论建构的。在“绪论”中，小寺将所谓“支那”问题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这关系到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太平洋是日本的肝脏，同时也是美国的胃腑，其制海权的解决，已经使深谋远虑的两国政治家倍感忧心，最后的胜利者，当然属于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国家，此乃自然之理。日本在人种、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在对支那关系上有特殊优势。相反，美国与日本竞争的唯一的东西就在资本，在于它利用丰厚的资本一步步地实现其目的，这一点不难预料。因而支那问题就有了太平洋问题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所谓对华政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小寺的这番话又表明，他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

<sup>①</sup> 关于冈仓天心的论述，可详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11。

夺,而争夺的对象实际就是中国。因此,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反复强调日本如何在“人种、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对华关系上占有优势,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作为亚细亚旧文明发源地的支那与新文明先觉者的日本要事业协同。倘若日本依托支那,利用其经济资源,支那依靠日本在政治上受益,那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亚细亚主义的第一步。”

《大亚细亚主义论》共有五章。其中,第一章《欧洲大战的教训》,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大战将国际公法和国际道德破坏殆尽,不存在也不可依赖所谓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在现在的情况下,“和平主义是现代的空想”,“绝对和平不可能”;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家的生存依靠的就是实力,依靠的是奉行“良兵良民主义”;实力包含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而日本要自给自足,增加实力,首先就是要繁殖人口,因而日本在“满鲜”(即满洲和朝鲜)的“开拓”对于日本人口的繁衍和国民素质的改善十分重要;同时,物质上的自足是当务之急,必须增加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现在需要进口面粉、肥料、棉花、羊毛及毛纺织品,都要实现自足;还要拥有独立的武器生产能力,但日本的制铁业缺乏铁矿资源,作为能源的石油也依靠进口。因此,在这些方面日本都需要强化与支那的关系。这是“亚细亚主义的基础”。在这一章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中,明显地流露出小寺对日本在人口、能源方面的忧虑,也就再次显示出了他在序言中所强调的“日本依托支那、利用其经济资源”的良苦用心。

第二章是《列国对于支那的政策》,分析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对“支那”(中国)的政策,认为这些国家的总体政策是瓜分支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确立“指导支那、并保全其领土的断然的外交政策”。他声称:“日本是亚细亚文明的传承者”,“支那与日本是一个民族的双生儿”,所以“有保护支那的充分理由”,并说:“日本在大陆建立立脚之地,并不是侵略支那领土,而是在巩固本国防卫的同时,有助于支那的保全,为的是保障东亚永久的和平。”为什么日本有权力在中国建立“立脚之地”呢?小寺谦吉写道: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当时,俄国以锐不可挡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止(俄国),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而战后日本之所以继承了俄国的权力,把满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理由不外是:(1)对于将来列强的势力入侵,支那的势力不足以防遏;(2)既然日本承担了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就有必要在大陆建立立脚地,以保持与其它强国的均势;(3)要保护作为战胜国的所获得的铁路、港口的经营及其它权利。当年与朝鲜合并,其目的也是因朝鲜没有自立能力,而且朝鲜反复无常、幼稚的对外思想一直是东亚和平的危险因素,就只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以永远断绝纷争。也就是说,现在日本在满鲜的政治地位,不是目的之表现,而是由其他的目的所产生的结果。<sup>[1](240~241)]</sup>

对于日本占领台湾,小寺也以同样的逻辑辩解说:在列强觊觎中国沿海的情况下,“一旦台湾为这些强国所据,那么黄海、渤海、日本海一下子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了,太平洋的海权就势必为列强所支配。而日本领有台湾,就除去了这种危险,保住了太平洋的均势。这一切都出于保卫东亚和平的目的,哪里是乘支那衰弱而侵夺其领土呢?”他强调,日本要“保全支那”,是认识到“支那的灭亡与全体黄色人种休戚相关,支那的瓜分,事关远东政局,进而影响日本的隆盛,事关亚细亚文明的消长”,保全支那,是“基于两千年间两国的历史、感情和友爱”。

第三章是《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础》。在这一章里,小寺谦吉一方面痛斥西方白人的人种偏见,一方面又鼓吹“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人种战”。他回顾了历史上欧亚对抗的历史事件,包括古代的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战争,匈奴人攻进欧洲、阿拉伯人席卷欧洲、欧洲十字军东侵、蒙古人远征欧洲,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等,从而提出“人种竞争是黄白两种人种之间的对抗战”。

小寺还分析了欧洲各国及澳洲的“黄祸论”，认为这些“黄祸论”多是针对日本和中国的。小寺针对西方白人宣扬的“黄祸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白祸论”。他认为，“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以亚细亚的势力对抗欧罗巴的势力。黄色人种中的独立民族要相互协同，通过不断的建设提高各自的生存力，以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文明，以对人类文明历史有所裨益。盖此主义就是永远防止同一人种之间的争斗，并且依靠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均势，防止不同人种之间发生战争。从这一点上说，大亚细亚主义不失为和平的一大福音。”他还把大亚细亚主义的实现分为四个阶段（四期）。“第一个时期，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中的最强国日本和最大国支那，在此主义下的统一；第二期是把同族（黄色种族）中的独立国民包括进去；第三期是把异人种统治下的黄色民族在此主义下统合起来；第四期是逐渐涉及整个亚细亚所有民族。在这四期中，“当务之急是第一期的事业”，即日本和“支那”的“统一”。他认为妨碍这种统一的是中国人对日本的“猜忌”，就是中国人的“恐日病”。至于这种“猜忌”和“恐日病”是如何产生的呢？小寺认为其原因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中国方面。在于中国人的误会，在于中国人还不能充分理解“大亚细亚主义”，同时也是欧美列强从中挑拨离间的结果。他指出，建立在“大亚细亚主义”基础上的日本与“支那”统一是双方互补互利的——

日本向支那供给知识，支那向日本供给物资，日本对支那提供军事援助，支那向日本提供经济利益。支那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支那位于大陆，日本位于海洋。以我之长，补彼之短，以彼有余，补我不足，两相得利而不相失。支那可在日本的指导下成为大陆军国，成为亚细亚的陆上守护使；日本作为海军国，以其权威成为太平洋的提督国。只有如此，才能谈黄白两种人种的对立，才能实现人类的平等、世界的和平，才能使亚细亚文明调和融化欧罗巴文明而形成伟大的新生命，使世界各方大放光辉。大亚细亚主义的使命就在于此。<sup>[1](474~475)]</sup>

在第四章《支那的现状》中，小寺对中国的历史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疾患重重，在军事上疲弱无力，兵力上比从前反而退步，海军有名无实。历史上的“易姓革命”，造成一次次的内乱，已成为历史上的通患，难以根除，而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对现在的中国也不适当，现在所谓共和制完全是“赝品”。在政治上，中国一直没有形成适宜的政治制度，因而，“最后还是需要日本的指导”。中国在财政方面困难重重，依靠借款维持，导致军备萎缩，行政涣散，而且财政权不统一，币制也不统一。在社会方面问题成堆，整个社会风气保守停滞，局势动荡不安。在外交方面，历史上的“远交近攻”思想遗害无穷，而且具有“事大主义”。以为美国为“大”，殊不知实际上美国不足恃。……小寺谦吉对中国现状的这些分析是要说明，中国在一切实方面都不行，所以必须由日本来“指导”才能解决问题。

《大亚细亚主义论》的第五章是《大亚细亚主义和支那的保全改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占全书的一多半的篇幅。在这一章里，小寺对日本如何处置中国，做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小寺谦吉说，日本在和支那提携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把积贫积弱的今日支那从垂死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要确立富强之策。而这一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全支那的领土，免去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二是要帮助、指导支那的改造事业，使其具备富国强兵的名与实。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所谓日支亲善就没有意义”。一句话：就是“保全”和“改造”两端。

那么，小寺所谓的“保全”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所谓支那领土保全，顾名思义，就是避免支那的解体和分裂。就此来说，有了分割论，才有了保全论。”他指出：“起初支那过于自负，挑起了甲午大战，结果暴露出自己的腐败衰弱，同时也埋下了领土被瓜分的祸根。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陷于不得不向日本请和的败地，却不肯抛弃图谋日本之念，越发重视远交近攻之策，依靠其他三国的干涉，在所谓租借的名义下，开启了事实上割让领土的端绪。二是实行了错

误的战后经营的方法和顺序,大举募集外债,企图改革,却给外人找到了获得其资源的最佳机会和口实。这样做的结果是,支那的命运很快陷入悲惨的境地。”总之在小寺看来,“支那”领土被分割是“支那”自招其辱。而日本在此后却为“保全支那”做出了重大牺牲。他把日本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说称成是日本为“保全支那”而进行的战争,说日俄战争遏止了俄国的南下:“日本付出了死伤二十二万人的鲜血的代价,直到今天还背负着不少的外债,其结果是,日本保全了支那,而自己损失亦大。”他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俄国等列强认识到了日本的“真价”,使得他们不能在无视日本的情况下随意行动,日本才有可能以日本为中心和他们缔结一系列有关东亚和平的国际条约。小寺认为那些和约能够“成为支那独立和保障其领土保全的支柱,都是因为日本可以作缔约国的对手。而反观支那自身,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其签订保全其领土的条约。归根到底,支那是靠日本的外交政策才确保独立的。这样说决非过言”。在小寺看来,现在“支那”处在了被西方列强“分割”的危险中,“瓜分支那的形势已经成熟,换言之,准备已经停当。如今只待时机实行了。所谓瓜分是什么?无他,就是列强在支那领土上设定的势力范围”。“严格地说,支那的分割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如今的现实”,而“支那的分割只对其他强国有利,而对我日本帝国却是不能不忧虑的危险。日本在支那建立立脚点,是自然的理数,有着和欧美诸国全然不同的性质。”小寺极力要把日本“在支那建立立脚点”与欧美列强的“支那分割”区别开来,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日本必须在“支那”“立脚”的政治的、经济的理由。

关于政治上的理由,小寺认为,如果“支那分割”成为现实,那就使欧美列强得陇望蜀,加剧日本和他们在亚洲的军事竞赛,而使日本四周布满白人,必令日本不堪。“对于欧美列强来说,支那的分割,就是将其国旗插到领土之外,而相反,站在日本的位置上而言,就是让竞争的列国势力引到自己脚下。”关于经济上的理由。小寺说,“支那是世界上的大市场,更是一个农业国,其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农民,所以不是工业国,而是原料的供应国,商品的需要国”。而日本却不同,“它可谓得天独厚,晚近我国的工商业显著进步发达,以最近的态势与欧美的先进国相比也不遑相让”,只有“保全支那”,才能维持日本广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两国的经济“自给自足”,即支那的资源供给日本,而日本的商品供给支那。“支那的领土保全,保持其广阔市场的开放,因而对于日本经济极其重要”。他甚至说“这间接关系到日本的死活问题”——

更可怕的是,如果支那被分割,欧美列强把丰富的资本注入其新领土,在开发富饶资源的同时,使用本地的原料,以低廉的工资雇用本地的工人,以经营各种工业……不仅满足了支那全部的需用,而且还倾销到日本、印度、阿富汗斯坦、波斯以及南洋诸岛,更进一步向欧美方面逆向出口。假如出现这种态势,支那全土面目将大变,远东就会形成令人吃惊的繁荣局面。然而日本的命运却又如何?对白色人种分割支那、实现其白人统一世界的理想并开辟新的纪元,决不能坐视不管。<sup>[1](1075)</sup>

此外,小寺还从“太平洋问题”的角度,强调日本只有“保全支那”,才能确保能够与美英等国等在太平洋地区的抗衡。

总之,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考量,为了日本的安全和扩张,为了日本的经济利益,为了防止由西方的投资所可能导致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日本就要阻止西方列强对支那的“分割”,这就是小寺谦吉的核心意思。乍看上去,“保全”似乎总比被“分割”好,也比“分立”好。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小寺谦吉的,实际上也是日本人的所谓“保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所谓的“保全”或“领土保全”,既不是“保”,也不是“全”。小寺谦吉竟“创造性地”把完整的中国领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内地,另一部分是“外藩”,他写道:

曾作为大支那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外蒙古、西藏,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支那的政治的羁绊,成为自治国。前者在俄国的保护之下,后者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支那的主权已经

达不到这些藩部，只是名义上的……支那只拥有宗主权的空名，而不是蒙古和西藏的统治者……事实上这些外藩部已经失去了保全之实，要保全它们，不合事实。<sup>[1](1099~1100)</sup>

在小寺看来，外蒙古、西藏由于已经处在了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就成了“外藩部”，到此，他才把其“领土保全”的独特含义挑明——

所谓领土保全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力不能保全领土的国家，依靠外力遏止行将灭亡的颓势，而并非恢复已经丧失的东西，或者解除已经接受了的主权限制。因而，所谓领土保全，当然必须把这些外藩部除外，像满洲、内蒙古按照这一基准都应该除外，这是自然的命运。<sup>[1](1100~1101)</sup>

按照他的界定，“支那”可以“保全”的“只是本部十八省，而外藩部不能包括在内”。到此，小寺在前头所讲的日本帮助“支那”免于西方列强“分割”云云，不过是一块侵略中国的遮羞布，不过是日本和列强一起瓜分中国，确立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词。所以，一方面他痛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而另一方面却欣然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已得到的一切——

现在，支那对于满洲来说，只是一个地图上的主人公罢了。这是自然之势。并且满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是列国一致承认的。<sup>[1](1101)</sup>

这种前后的相互矛盾，不过是为了日本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也能得到列强的“承认”。他还进一步无耻地罗列日本侵占满洲的理由，认为“支那”太大，而满洲土地蛮荒，民族不合，土匪盛行，是个是非灾祸之地；“支那的统治在外藩部不受欢迎”，而把满洲给日本，则对“支那”是一个好事，“从支那内政上说，卸去了一个负担，免除了统治上的一个祸根，对外则可避免与比邻强国的冲突，避免外患，不必动用‘冗兵’，也能节省不少的不必要的财政费用，从而得以把精力集中于自国本土的改革振兴”，因此对“支那”有益无害；还说这样一来，“就好像一个人体，不切除患部，就会加重病情，祸及全身，最终失掉性命，故名医勇于对患部做切除手术。同样，割掉了生了疾患的地方，以集中精力统一、改善本部十八省，以避免国家危亡，是支那聪明的政治家应该采取的手段”。他反复强调说：

……支那断然放弃满洲，彻底清理造成日支两国隔阂的一切问题，使两国真正唇齿辐车相倚，理想的事情莫过于此。盖以支那衰弱到今日地步，若勉强支撑全土，甚至连一个省都保不住。相反，要使支那恢复实力，恢复元气，就得放弃外藩，则恢复决非难事……满、蒙、回、藏等外藩，姑且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先把十八省加以统一和巩固，以屈求伸，是时机也。这实在是大亚细亚主义实行的第一步。<sup>[1](1111~1112)</sup>

到此，小寺谦吉已经论述得十分到位了，原来，这就是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所谓“支那改造”的关键。在他看来，只有放弃满蒙，让于日本，“支那”才能“改造”，“支那的改造，应去其虚，取其实，致力内部统一，消除外部祸患，揣摩实力，顺应时事，改革鄙陋现状，开拓新局面，忍眼前小辱，立百年远谋”。

那么，日本到底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支那的改造”呢？小寺声称这是因为日本在各方面的实力近年来都突飞猛进，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其中包括：由于欧洲大战，交战国两败俱伤，日本的国力进步却反比例地挺进；由于欧洲大战，日本的海运业及其贸易（包括军需品）的出口显著发达，资本增值；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被驱逐，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日俄新协约的缔结，在远东的均势向日本倾斜，等等。所以小寺声称：“对于日本来说，作为亚细亚的指导者，亚细亚的盟主是当之无愧的”，“日本已经成为远东和平的支柱”。在他看来，在“支那的改造”中，离开日本也绝对不行。他强调：

要而言之，最近的新的趋势是，列强们对于日本在支那的特殊地位，已显出越来越认同的倾向。而日本所具有的集大成的、综合的、映发的文明，对于支那的改造是必要

的处方。而日本人的经验、天才智能也是指导支那改造的最适当的东西。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支那要拯救本国,其唯一可采取的手段,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和日本结成最巩固的提携,在其改造方面,应该真心真意信赖日本。<sup>[1](1144)</sup>

如何信赖和依靠日本来进行“支那改造”呢?小寺认为应该分为政治与军事改造、经济改造、社会改造这三个方面。关于政治军事改造,日本应派遣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到“支那”去,具体加以指导。在军事上,他认为有日本的保护,中国所以要裁军。关于经济改造,小寺说在财政的统一和币制的改革方面,应该相信日本,要利用日本人的能力,在中国建立采矿业、修建和经营铁路;“支那”要放弃“极端的产业保护”,许多产业应该实行“日支合办”。在社会改造方面,小寺说中国的“语言不统一”,各地发音不同,要加以统一就必须依靠日本人的指导,他说,现在有人提出使用西方的罗马字来统一语音,但那毕竟是西洋的东西;如果采用日本的イロハ假名文字,“和汉字相辅相成,其效果会更好,会更加巩固两国辐车相依的关系”。但是,中国如果也采用日本的假名,实行汉字与假名的混合,那汉语岂不就变成日语了吗?小寺对此没有细说,但他的用意显然就在于此。按照小寺谦吉这样的设想,在日本指导下通过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全面的“支那改造”,中国实际上就完全被改造成了日本的附属国。

到此,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的面目十分清晰了,他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是使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外藩”满蒙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由此,“大亚细亚主义”第一阶段的目标就实现了。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随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和确立,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之一,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大亚细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进一步继承、发挥并付诸实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 参考文献:

- [1] [日]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M]·东京:宝文馆,1916.

## From “Merged States” “an Integral Whole” to “Great Asianism” — A Theoretical Form for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WANG Xiang-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ll of the “great east merged states”, “Asia as an integral whole” and “great Asianism” belong to a theoretical form for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As a soft theoretical form for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t coordinated with the hard one, namely, to invade China by armed forces. They were both opposite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ir essence was to annex China, with the intention of changing China into a dependent state of Japan. Tarui Tokichi’s “theory of great east merged states” advocated at first to set up a great east coun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apan. As a book over 1, 200 pages, Odera Kenkichi’s *Theory of Great Asianism* epitomized the theories of great Asia, at the very core of which was Japanese dominion over China and Asia realizing by compelling China to give up sovereign rights and to endure Japanese “remould”. As a matter of fact, “great Asianism” was equal to “great Japanism”.

**Keywords:** Japan; theory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great east merged states; Asia as an integral whole; great Asianism

【责任编辑 金霞】